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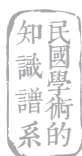
考古學的考古

朱淵清 主編

中西書局

考古學的考古

朱淵清 主編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的考古 / 朱渊清主编.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

ISBN 978-7-5475-1652-2

I. ①考… II. ①朱… III. ①考古学—文集 IV.
①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5374 号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考古学的考古

朱渊清 主编

责任编辑 邓益明

装帧设计 黄 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2 000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652-2 / K · 321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56475919

目 录

关于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	朱渊清 / 1
甲骨文与西方汉学	汪 涛 著 牛海茹 译 / 1
重创“经典”：罗振玉和谢阁兰的考古学	汪 涛 迪尼斯·梭德(Denis Thouard) / 28
明义士在华期间的文物收藏及其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方 辉 / 54
博物学家劳费尔的古玉研究	朱渊清 / 71
李济与安特生 ——从高本汉写给李济的三封通信谈起	陈星灿 马思中 / 103
蒙特柳斯与中国考古学	陈星灿 马思中 / 125
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陈洪波 / 137
梁思永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	陈洪波 / 147
金村镜像：考古学史和物质文化的建构	徐 坚 / 175

关于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

朱渊清

2012年,我和朋友们编了《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2017年4月,我曾为这套书写了一个长序。现在这套书终于要出了,我想简单地说一下编辑这套书的一些想法。

研究各种不同学术领域,都要去追溯相关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就存在于人们为发展、创新学科而作的知识的回顾和反思中。我个人理解的学术史,还不是证明通向今天的知识权力之路:不宣示正统、不标榜权威,而是探寻过去曾经出现却未能被承袭的那些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它们就好比知识之路上的一个个潜在指向另外通路的标识。我们发掘某一个时代文化的知识地层,发现找到这些潜在的标识,重新思考它们的可能性和意义。正是这种清冷的工作,今天的知识之路因此才得以拓宽,今天的学术因此才更具有反思理性的价值。学术史,在我看来也可以说就是重新梳理知识谱系的工作。本书是关于民国学术史的,作者是文科各学科的专业研究者,他们将各自对本学科的学术史反思书写出来,对于今天有特别的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中文缩简译本),^①石破天惊般的震撼,一读再读,为福柯的历史思想所深深吸引。之后读了更多福柯的东西,特别受益于《知识考古学》。^② 福柯用考古学的地层学思想来考察知识与思想史,指出历史

① 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是断裂的而不是延续的。这引导我走上研究历史之路,并且着迷于思想与知识史研究。福柯晚年以“知识—权力—身体”三角关系作谱系学分析,用知识谱系学代替自己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用这种谱系学分析方法,福柯写出了《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福柯的谱系学考察产生知识的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相比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福柯放弃了对“深层意义”和“本质”的追问,而关注“表层”,寻找时间的细节、微小转换和细致轮廓的外现,用福柯自己的话:“谱系学是灰色的,注意细节的。……谱系学要求耐心和对话细节的知识与广泛的原材料的积累。”福柯以此谱系学反对黑格尔似的绝对理念展开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并非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福柯反对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反对决定论,他是要书写“问题化的历史”。福柯对历史呈现在表面的花纹作细节的梳理和谱系解读,在历史面前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打破决定论迷信的科学研究方法。我将这三本书称为《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是向福柯致敬,我们同样试图书写“问题化的历史”,发掘新材料,用细节来展开思考。

感受真实外物是知识的来源。很多年前去卡纳维拉尔角宇航中心,展柜里有一块美国宇航员从月亮上捡回来的石头,展柜上开一个可以伸入一只手的圆孔,这是专门用来给人们触摸感受的。美国和欧洲的城市,有专门出售化石的商店,旅游景点上小摊贩出售各种化石和化石制品更是随处可见。小孩子购求收藏古巨鲨、剑齿虎的牙齿化石,恐龙的爪和骨化石,从小爱好亲近这些东西,对探索古生物学、矿石学的知识,有着无比的帮助。说到考古学,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弗吉尼亚自己的田地里发掘,第一次把一座土墩墓横切出了一条探沟或剖面,从而开创了现代考古学。可惜在知识来源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很多是全然直觉的神秘通见,拒斥所有的闻见之知,甚至不依靠任何符号,而可以直接深入事物内部,与事物融合为一。老子“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孟子接受并发挥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认为心是思的器官,只有心才能思;耳、目如果去接受外物,只能受到外物的诱引而妨碍心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①孟子还强调“志”对“气”的指导,使气运行身体内受到“义”的养育而至大至刚,成为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气,然后就可以“内圣外王”了。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在本文化里如何去做“人”,绝少鼓励,甚至是禁绝对外物知识的探索。

东汉“学问开始带有校勘学、考古学的性质。它已不单纯是思想的产物,而变成了附有历史内容的学问”^②。魏晋个人觉醒,一些最优秀的学者直面自然追求真知。虽然陆玕、郭璞还是以为经作注的传统形式在作品中植入自己探索的新知,但是他们的发现真是了不起。张华第一次记述了石油及其特性,郭璞详细描述了大熊猫、白鳍豚。^③可惜这样的学问和做学问的方法,传统社会中少有传承。魏晋时期陆玕、张华、郭璞等人的知识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面向自然、面向真实外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最早指出西方早期博物学中存在一次与数理科学革命内在关联的认识型转换,但魏晋博物学并未在中国引发可以导致科学革命的认识。

明清一些模仿《博物志》的著作,比如明董斯张的《广博物志》,是神话、传奇、故事、器物等等分类抄录的类似类书的“杂烩”,其知识的兴趣在于广记异闻,而完全不在于探索、发现和不断地批评求真。我猜测董斯张的这部容纳宇宙万物知识的庞大著作,有可能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并且就此成为福柯《词与物》的“前言”开始讨论的对象。当然,也可能是《太平御览》。

福柯说他写《词与物》,是受博尔赫斯的启发,博尔赫斯曾引述过“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对动物的如下分类:(a)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香气的动物;(c)驯服的动物;(d)乳猪;(e)美人鱼;(f)臆想的动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i)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不可胜数的动物;(k)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l)其他动物;(m)刚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

③ 朱渊清:《魏晋博物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n) 远看像苍蝇的动物。^① 福柯说:“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界限,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去思考。”^②“那么,不可能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哪种不可能性呢? 这些奇异标题中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给予确切的意义和可表明内容;某些标题确实包含稀奇古怪的生物: 传说中的动物或鳗螈,但是,恰恰是因为把那些东西置入它们各自的位置之内,这部中国百科全书才能定位它的传染力;它谨小慎微地把十分真实的动物(那些发疯的动物,或刚打破水罐的动物)与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动物区分开来了。”^③福柯意识到:“侵越任何想象和任何可能思想的,仅仅是把所有这些其他范畴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英文字母系列(a、b、c、d)。”^④福柯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中国有一个包容宇宙万物的,并且被固定分类所预先规范的知识认知体系。这就是绝大多数唐宋类书所代表的,以天、地、人、事、物、鬼、神无限展开的知识分类体系(《太平御览》有更复杂的 55 部分类体系)。用预先固定的分类体系来表示宇宙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举代数学为例。中国以算法为中心的筹算制度,未能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筹算数学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到达极限,再向前发展必须向符号代数转化。元初,朱世杰(1303)用天、地、人、物来表示四个未知数,其系数分别放在“太”的下方、左方、右方和上方。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只能放四个未知数。如果有五个未知数,就无法安排,推广到 n 个更不可能。突破筹算限制向符号代数转化没有完成,中国数学就此出现三个世纪的中断。^⑤ 其实,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数,已经有了引入符号的特征,可惜这套符号带“场”出现,表示的是文化的宇宙观秩序。

①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 年,第 1 页。

②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 年,第 1 页。

③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 年,第 1 页。

④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2016 年,第 2 页。

⑤ 梁宗巨:《从数学史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年。

中国古代知识的分类体系起源于“小学”《尔雅》，这是孔子及其学生为解释《诗》、《书》、《礼》、《易》、《春秋》语词含义而开始编辑的词典。中国古代的知识是以经部为核心的。“经”是规训的知识。所谓六艺，说明了“经”的来源。春秋末，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他整理的书籍课徒。《隋书·经籍志》说人何以为人的六教。春秋后期，略早于孔子，齐国的五官技和楚国的九门学也都是规训的知识。^① 古籍四部分类中，经部之外的其他部都是经部的扩充和修饰。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是规训型知识。规训型知识是老辈人形塑、教化、规范小辈人，教育他们“其何以为人”、如何做人的知识。这种以人的规范教育为目的的知识系统，忽视自然界、忽视实物、忽视人自身的各种技术发明和创造。我以探索型知识与规训型知识对应。探索型知识是直接面对自然界、积极认知真实外物、积极创造与发明各种技术，通过批评质疑而不断求真的开放的知识认知系统。中国历史上，在万千科举状元进士之外，还是有张华、郭璞、沈括、宋应星、徐霞客这些传统文化的异类。不管如何，人类知识在社会中保存传承，却只能创造发明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大脑中。

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传入，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民国初年，旧的知识体系终于瓦解，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大量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分析思维的方式，是由罗振玉、王国维、丁文江、胡适、傅斯年他们接受、引介进入中国，他们成为民国新学术的引导者。罗振玉和傅斯年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关于学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非常运气的是殷墟发掘震惊世界，科学的考古学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罗振玉贡献了殷墟在安阳小屯的准确地理位置。罗振玉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甲骨始就以个人之力全力搜求研究，对甲骨卜辞的年代、卜法也有开创性研究，他的指导及其收藏品还帮助王国维作出了商代世系的重要研究。但是罗振玉的“器物学”（包括

① 朱渊清：《五官技和九门学》，《知识的考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64页。

艺术史)在中国却很难发展起来。这背后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在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了。

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需要物产权的法律保障。意大利美第齐家族的文物和艺术品鉴赏和收藏活动,与银行业乃至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墨子和孟子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政治思想: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死丧有埋葬。乌托邦政治思想中没有“产权”概念,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历史,从来就没有对产权的初始界定和重新安排以选择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的契约的法律制度。孟子和梁惠王谈与民偕乐,说到用民众之力造灵台、灵沼,与民共赏鸿雁麋鹿,前提还是洿池山林都属于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以及土地埋藏和生长物的所有权从来不在民众手里。孟子要求“明君”“制民之产”,所以他的“有恒产”之说^①我总感觉不可靠。当然,我赞同孟子有自由经济思想。^②

罗王之学,是要从文献走向实物真实。王正华关于罗振玉的收藏的研究引人深思,完全渊源于个人兴趣的个人知识,在现代考古学的初起之时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最近读到类似的一个关于吴大澂收藏的研究。^③从吴大澂到罗王是中国传统古器物学的延续,但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转折。就我自己来看,罗振玉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还远不止于王正华所写。我本人曾写了一篇7万字的长文《王国维的困局》,因为体例和篇幅等原因,此次没有收入,有点遗憾。徐坚关于李家楼、洛阳金村出土文物及其搜集整理的研究,是他寻找的“潜流”。汪涛、陈星灿、方辉的几篇关于中国考古学初起时的文章,利用非常难得的档案材料告诉我们一些不可忽略的关键细节,也提醒我们更全面更审慎地评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作用和影响。相比之下,我关于劳费尔的《中国古玉》只是一个读

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侯家驹:《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63—158页。

③ 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书笔记,出现在书中仅仅为弥补劳费尔这位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少人问津的遗憾,到目前为止,他两百多种作品中仅有《中国伊朗编》和《中国篮子》^①被翻译成中文。

我本人写了朱希祖史学的文章。朱希祖是近现代学术史上几乎完全被遗忘的重要学者,他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学科课程体系的最早设计者,对国史编纂、档案整理、地方史志、文物调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历史研究,从先秦一直到太平天国乃至民国初年,范围广涉历史研究的几乎所有分支学科。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汲冢书考》迄今为止还是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翟志成现在的胡适与钱穆的论文,是遵从翟先生最近的意见。7年前,我向翟先生求要的另一篇论文不能收入,我感到遗憾。那篇论文是关于胡适和冯友兰两本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显然就哲学史言,冯书超越了胡著。胡适是最宽容大度的人,然而在对待冯这个超越自己工作的成绩时,他的表现并不能坦然。徐雁平的文章与这套书的整体风格似略有不同,但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雁平兄利用族谱作的家族史研究很富特色。

赖德霖贡献了两篇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论文。德霖兄是清华大学学建筑的工学博士,又是芝加哥大学的艺术史博士,由建筑设计师来写的建筑史是很可珍视的。李军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时间跨度上已经超过了民国。李文对沈从文的思想的解读富有激情和启发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可以不说,不能胡说”的沈从文放弃文学,从事器物学研究。中国现代古器物学的建立,与一个仅仅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文学家紧紧相连,这是我执意收入军兄文章的原因。我大学的启蒙老师程应镠先生可以说是沈从文晚年唯一的朋友。程先生上课经常说到沈从文,说他闭着眼睛摸一下瓷碗的底就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沈从文先生后半生的大部分日子不好过,但他以个人之力,几乎重

① 贝特霍尔德·劳费尔著,叶胜男、郑晨译:《中国篮子》,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考古学的考古

建了现代中国的古器物学学科。

《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分“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与艺术史”三个部分。当然这些仅仅是民国人文学术的一部分。

2019 年 11 月 21 日草

甲骨文与西方汉学

汪涛著 牛海茹译

早期传教士学者：方法敛、库寿龄、明义士

甲骨文的发现有点像“神话”。要准确考证出甲骨文的发现时间和发现者,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只知道最早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从地下挖掘出了这些古物,将它们当作“龙骨”卖给药店。直到十九世纪末,“龙骨”才开始引起收藏家和古董商的兴趣。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过程,有一种流行的版本是这样的:1899年,清末著名收藏家王懿荣(1845—1900)从北京菜市口中药店购买的中药中发现了刻有文字的“龙骨”,并认为这是商代的文字。中国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家除了王懿荣,还有端方、孟定生、王襄(1876—1956)、刘鹗(1857—1909)、罗振玉(1866—1940)等。^①

四年之后,也即1903年,山东潍县的美国传教士方法敛(F. H. Chalfant, 1862—1914)和山东青岛的英格兰传教士库寿龄(S. Couling, 1859—1922)也开始收藏甲骨。起初他们并不知道其他学者也在收藏甲骨,因此可以被视为一次独立的发现。

在中国近代史上,190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天津、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趁机入侵中国。是年,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

^① 多数学者同意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是在1899年。但是,对于甲骨文的发现时间还是存在一些疑问,例如王懿荣认为自己首次发现甲骨文是在1898年(引自王宇信1989:24—32);另外一种说法是胡石查从1894年开始搜集甲骨文(引自胡厚宣1993)。甲骨文发现细节考证和早期研究有:董作宾1965;胡厚宣1993;黄然伟1967;雷焕章1975。

臣王懿荣投井自杀。他收藏的甲骨流散各地,其中一部分也流散到了中国北方的古董集散中心——山东潍县。古董商优先把甲骨兜售给那些既对中国文物感兴趣、又有购买能力的外国传教士。

方法敛 1862 年生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1887 年由美国长老会代表团派往山东传教。在那里他结识了库寿龄,一位比他早三年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与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方法敛和库寿龄都是非常勤奋的业余学者,他们将大量的业余时间投入学术活动中。

但此时方法敛和库寿龄并不知道中国其他的甲骨收藏家已初具规模,他们对自己的新发现兴奋不已。他们第一次购买的甲骨,是从一位古董商^①的 3000 片甲骨中选出的近 400 片。1904 年 2 月,他们把这批甲骨出让给在上海的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在库、方二氏的帮助下,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也开始建立甲骨收藏。几个私人收藏家也通过方法敛之手买到了一些甲骨。^②

1906 年,方法敛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馆刊》上发表了《中国原始文字考》,^③该文中翻译了著名的铜器铭文《散氏盘》,并公布了 17 片甲骨摹本,这表明他对中国古文字了解颇深。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方法敛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并试着解读甲骨文。尽管他的考释有许多想象和猜测的成分,但毕竟是西方学者首次尝试考释甲骨文。另外,他还尝试拼合破碎的甲骨。他认为一版完整的龟甲至少应该由五片碎骨组成。

我们还应提到的是:方法敛最初研究甲骨文时,他对中国甲骨学界的前沿成果并不了解。早在 1903 年,刘鹗就出版了《铁云藏龟》,但此书只著录了甲骨拓本,没有考释,而且流通不广;^④同样,早在 1904 年经学大师孙诒让

① 山东潍县的两位古董商范潍卿和赵执斋,首先把甲骨卖给了王懿荣和刘鹗。方法敛最早是从李茹宾手中购买甲骨,李可能就是范、赵两人的朋友。

② 这些私人收藏家包括 Bergen、Hopkins 和 Wilhelm 等人。参看 Britton 1938。

③ 方法敛 1906。

④ 很难考察方法敛是否读过这些书,因为他虽提到过《铁云藏龟》的出版,但是对该书中甲骨摹本总数的引用并不确切,他认为是 800 片,但实际上是 1058 片。

就考释出了许多甲骨文字,但是直到1917年他的《契文举例》才得以正式出版。可以说,方法敛的研究一直是独立进行的,因此他的探索着实令人钦佩。

方法敛的研究很快就得到了关注。1906年,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科学》发表了E. Morse的一篇评论;^①另外,《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会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者说道:“方法敛的研究阐明了汉字起源于表意符号。”^②卡内基博物馆馆长霍兰德(W. J. Holland),在给《中国原始文字考》写的序言中说:“方法敛先生的论文并没有局限于已知材料,文章也包含了他对新考古材料的初步研究。这些材料(包括甲骨文)是他自己或通过他人从河南获得的。继续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必然能够得出很有价值的结论。”

方法敛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对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甲骨,包括他本身和其他人的收藏,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但不幸的是,1911年他在青岛遭遇一场交通事故,从此瘫痪在床,三年之后于美国匹兹堡去世,留下了大量未出版的手稿。^③

库寿龄是方法敛在甲骨文发现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和伙伴。库氏1859年生于伦敦一个异教徒家庭。青年时代,他曾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后来到布里斯托浸礼会教会学院研究神学。1883年,他成为托特尼斯的一位浸礼会牧师。一年之后,加入了浸礼会牧师团,被派往中国。据说,他很快就掌握了汉语,并到一所寄宿学校任教。1902年,库寿龄从爱丁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此时他的年龄已经偏大,但仍然尝试读取其他学位,例如理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士学位。他在传教的同时也追求学术研究带来的乐趣,这种双重生活一直持续到1902年。是年,他从浸礼会牧师团辞职,开始了全职的学术生涯。但是这种生活是很艰难的,他被迫以家庭教师为职勉强度日。此后

① 笔者并没有看到过这篇文章。

② G. W. Pearson 1907。

③ 关于方法敛学术生涯的详细评价见于董作宾1965。

有段时间,他在上海梅赫德斯特学院(麦伦学院)担任代理校长。作为一名学者,库寿龄在1917年声名鹊起,主要是出版了畅销参考书《中国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Sinica*)。^①他还主编了双语期刊《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并受上海市政委员会的邀请编写《上海史》,幸运的是,此书在他1922年6月去世前就已完成。

由于大量的学术活动和管理职责,库寿龄只有很少的时间从事甲骨文研究。不过,他仍于1914年2月20日以会员的身份在上海皇家文理学会北中国分会作了一次长篇演讲,并著文发表在会刊上。^②演讲中,他向听众讲述了他和方法敛二人与甲骨结缘的有趣过程,并回忆了他们尝试整理和缀合甲骨的“美好时光”。^③

他们之间的愉快合作,在甲骨文中关键词“贞”的探讨中,也得到了见证:

以甲骨文中最常见的字形——“𠄎”字为例(几乎契刻于所有的甲骨之上),常见于日期之后、占问内容之前,因此,很容易将它理解为“询问”。方法敛认为它就是现代汉语中的“问”字;当然,把“𠄎”释为“问”也能使卜辞得到很好的解释。然而,虽然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甚少,但仍对此不太信服,也许是出于直觉吧,我不认为它是“问”。可惜我也没有更好的解释。数年以来,此事在我们之间一直是一个玩笑。但最后不论是方法敛还是金璋都意外发现:“𠄎”显然是“𠄎”的异体字,那么,“𠄎”不是“问”,而是“贞”,这就显而易见了。^④

库氏的见解跟半世纪后关于“贞”字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甲骨文极具变化性的书体风格,在甲骨学和考古学的关系上,库寿龄还提出另一

① 这本书再版时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了新的介绍。引自 Couling 1983。

② Couling 1914。

③ 库寿龄写道:“我和方法敛在一张摆满甲骨(尤其是新的甲骨碎片)的大桌前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试着将断口吻合的甲骨缀合在一起。而且每当成功缀合甲骨时,哪怕只是两三个小碎片的缀合,我们也会开心不已。”(Couling 1914: 66)

④ Couling 1914: 72。

个很有价值的观点：

我认为除了那些同版上刻有不同字体风格的甲骨外，其他甲骨都可以作为分期断代的证据。倘若甲骨是有意埋葬的，那么，最早的甲骨应该在灰坑的最底部，而最新的则应在最顶部；并且也应出现安排成序的甲骨坑。不幸的是，甲骨出土时，没有西方学者在现场观察。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是在独立有序的地层中，而不是从混合一体的灰坑中得到这些甲骨，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时代会使用一种独特的字体。在下一个时代中，它会被另一种字体所取代，最晚形成的字形会延续到现代汉语中。^①

库寿龄很有考古学的视野，他提出这一观点十五年后，殷墟才开始了科学发掘。直到现在，“不同的书写风格反映不同的时期特征”这一观点在断代时仍然很有价值。

在演讲中，库寿龄极力主张要关注亚洲文会自身收藏的甲骨。作为文会的资深成员，库寿龄曾先后担任过文会秘书、期刊编辑及文会副主席等职务。早在 1857 年，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建了“上海文理学会”，后来该组织加盟“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文会”，遂改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它的会刊后来也成为汉学领域中的前沿性刊物之一。

尽管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的主要成员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以及一小部分欧洲及北美的传教士，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一个绅士俱乐部。其主旨在于传播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教义，同时提高东道国的文明程度。例如，当时的主席在《上海文理学会会报》发刊词中写道：

我们的宗旨在于发现并积累事实以便加快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众所周知，西方存在一些长久的历史和哲学理论的问题，只有这个中华帝国能给予我们启示，为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②

① Couling 1914: 73。

②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1(June 1858)。